

镜像下的民俗文化研究

王洪涛 著



镜像下的民俗文化研究

王洪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镜像下的民俗文化研究 / 王洪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

ISBN 978 - 7 - 5203 - 0250 - 0

I. ①水… II. ①王… III. ①《水浒》研究②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①I207. 412②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460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孙铁楠
责任校对 邓晓春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山东省“十二五”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基地之水浒文化研究基地成果；山东省艺术科学重
点课题“《水浒传》镜像下的鲁西南民俗研究”（立项
号 1506501）资助项目成果

前　　言

民俗是在民众中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是由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具有集体性、模式性、传承性与扩布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等特征。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通过口耳相传、行为示范和心理影响等方式不断传播、继承与演变，既服务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生产，也规范着人们的语言、行为和心理。

《水浒传》是一部基于历史传闻虚构构成的长篇英雄传奇，在带给读者文学之美的同时，也赋予其所涉及地域亦真亦幻的历史镜像，甚至还由此衍生出无数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佳话传说。《水浒传》以北宋末年社会为背景，兼之其描写对象主要是鲁西南地区的“市井细民”，因而在整部作品中充满了丰富的民俗事象。可以说，《水浒传》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北宋时期鲁西南民风民俗的画卷，正是这些生动鲜活的民俗内容，加上作者丰富的阅历和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才造就了《水浒传》这部我国白话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基于此，本书研究了《水浒传》镜像下的民俗文化，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概述，综述了《水浒传》的相关研究和《水浒传》中的民俗文化；第二章是物质民俗方面的研究，包括《水浒传》中衣食住行的民俗研究；第三章是行为民俗方面的研究，包括《水浒传》中描写的节日、礼仪、游戏和竞技方面的民俗现象研究；第四章是《水浒传》中精神民俗方面的研究，包括语言、思想理念、宗教信仰等研究；第五章以鲁西南地区为例，对《水浒传》中的地域民俗进行研究，包括郓城、梁山、东平、阳谷四县；第六章是水浒民俗文化的开发与保护，研究了水浒民俗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水浒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的途径。

《水浒传》在带我们走进风格粗犷豪放、故事精彩绝伦的水浒世界的同时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古代鲁西南市井与乡村的风俗画卷，

2 《水浒传》镜像下的民俗文化研究

使我们不但领略到众多英雄豪杰的风采，还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宋元时代鲁西南民俗生活气息。对《水浒传》中民俗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宋元时期鲁西南地区的社会风气，为开发和利用当地文化资源提供有利的理论依据。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文献书籍，引用了众多学者的劳动成果，虽然书中附有脚注，书末也列出了参考文献，但是由于时间匆促，难免挂一漏十。加之作者学识水平有限，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研究概述	(1)
第一节 《水浒传》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水浒民俗文化概述	(17)
第二章 《水浒传》中的物质民俗	(30)
第一节 《水浒传》中的服饰民俗	(30)
第二节 《水浒传》中的饮食民俗	(42)
第三节 《水浒传》中的居住民俗	(58)
第四节 《水浒传》中的交通民俗	(63)
第三章 《水浒传》中的行为民俗	(69)
第一节 《水浒传》中的节日民俗	(69)
第二节 《水浒传》中的礼仪民俗	(79)
第三节 《水浒传》中的游戏民俗	(97)
第四节 《水浒传》中的竞技民俗	(107)
第四章 《水浒传》中的精神民俗	(117)
第一节 《水浒传》中的语言民俗	(117)
第二节 《水浒传》中的思想理念民俗	(127)
第三节 《水浒传》中的信仰民俗	(134)
第五章 《水浒传》中的鲁西南民俗	(156)
第一节 《水浒传》镜像下的郓城民俗	(158)
第二节 《水浒传》镜像下的梁山民俗	(166)

2 《水浒传》镜像下的民俗文化研究

第三节 《水浒传》镜像下的东平民俗	(169)
第四节 《水浒传》镜像下的阳谷民俗	(178)
第六章 水浒民俗文化的开发与保护	(181)
第一节 水浒民俗文化与中国社会	(181)
第二节 水浒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的途径	(194)
参考文献	(200)

第一章 研究概述

第一节 《水浒传》研究综述

纵观 20 世纪《水浒传》的研究，对其思想认识的主要观点是农民起义、市井生活、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忠奸斗争等，其中农民起义和市井生活的观点是对《水浒传》认识的主流。考察北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浒传》所表达出的新思想核心是要求平等。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小说所反映的新思想，在整个古代封建专制王朝时期所创作的文学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其所反映的思想在它们前后都不曾有，是古代中国极其珍贵的文学思想贡献。

一 《水浒传》的社会背景

（一）宋明之际的社会变迁

一般论及宋代社会，都认为北宋边事不断，割地赔款，战则败北，和则纳币，俯首称臣，国力衰微。终两宋之世，被视为乱离时代的延续。然而宋明之际社会变迁又呈现着与前代不同的新的时代特点：

1. 变化的时代

首先是田制的变化。从北魏开始实行的以“均田制”为标志的土地国有制度至宋终于完结。^①宋朝统治者顺应土地私有化的历史潮流，以“不立田制”为标志，实行“不抑兼并”及“许民请佃为永业”的经济政策，致使“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②。租佃

^① 我国西周是分封制，春秋晚期出现私田，秦商鞅变法实行过土地国有化，但同时秦《军爵律》《田律》又规定了私人土地所有权，北魏到唐朝一直实行以租庸调制为核心的均田制。

^② (宋)袁采：《袁氏世范》卷3《富家治产当存仁心》，知不足斋丛书本。

制成为土地私有制的主要形式，土地的商品化不仅奠定了宋代经济繁荣的基础，也同时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其次是身份的变化。我国从南北朝至隋唐，“均田制”下的部曲、佃客皆依附于主人名下而无独立的经济和法律主体地位。自宋朝建立以后，根据税力物产将全国户口分为主户和客户，客户即“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的下层农户。佃户虽无地产也编入客户，“租佃制”下的客户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与地主不是私人依附关系而是契约关系，租佃、退佃都受法律的保护，成为法律上的民事主体。南宋对民事关系调整的法律条文大量增加，个人在法律关系上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认可。

宋代传统市制瓦解，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思想将商人视为贱民，汉朝直接“以法律贱商人”，汉武帝视经商为犯罪，“发七科谪”（遭七种罪犯戍边）中也有“贾人”一科；唐朝仍用“团”“火”等形式对商人进行人身控制，商人户籍不独立，市、坊分离，经营时间受到限制，且“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北宋开始，商铺可面街而市，经营时间不再受限制。工商业者成为国家的平等居民。宋代社会门阀势力完全消失，科举取士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成为左右政治局势的重要力量。“以贵统官”彻底变成“以官统贵”。

宋明之际社会关系的种种变化总趋向是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人身的独立化、平等化，大量的人口从王权主义的经济、法律双重束缚之下游离出来，成为王权主义体制的离心力量，经济和身份关系的变化最终表现到人心的变化上来。严复曾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① 人心之变，反过来推动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②。

时代的变迁在水浒故事中有多处体现。梁山好汉一部分是脱离了土地束缚和身份关系的“游民”。另一部分好汉摆脱了身份束缚，如燕青对卢俊义由奴仆关系变为平等的“哥弟称呼”关系；晁盖、宋江等地主与庄

^① 《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页。

^② 这些变化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反复曲折的。南宋时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朝廷对地主阶级的依赖加强，佃客所受的超经济剥削有所反弹，以致到“亡宋以前，主户生杀，视佃客不若草芥”。元朝统治初期，落后的游牧经济冲击使两宋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关系也出现向等级身份制度的倒退。明初封建专制主义开始加强，社会状况到晚明才有较大发展。宋明之际新的社会关系没有突破封建王权主义的界限，宋明之际的社会思潮也就一直在王权体制的笼罩下翻涌，没有达到明确破旧立新的高度。

客由主佃关系，变为兵将关系。旧贵族的地位没有保障，柴进虽系皇亲国戚，但其失去了官势，很快沦为被欺凌掠夺的对象；新发家的工商户受人尊敬，卢俊义名满江湖。高俅发迹的故事也说明了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

2. 繁荣的时代

北宋伊始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解放促使宋元生产力上台阶式的发展，宋元之际科技发明甚多，促进了生产技术的提高。两宋赋税收入的大幅提升，社会所能养活的人口的激增，剩余产品的出现和人身约束的放松，带来了商品的大量流通和娱乐业的繁荣，文人画士对两宋城市生活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的繁荣。据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一书提供的《宋代岁出入缗钱表》表明，唐朝建中初行两税法时岁入缗钱3万余贯，唐宣宗初年税钱为860万贯上下。而宋初（960—997）则两倍于唐朝，为1600万贯。至开禧二年（1206）为8000万贯。两宋国土远小于唐朝，财政收入则十分巨大，说明了宋代的繁荣。

蒙元统治带有异质文明性质，其早期曾给中原农业文明带来很大破坏，而元人重视商业，加之国土广大，国内外贸易发达，城市经济便很快繁荣起来。当时的大都、杭州、广州都是国际性的大都会，西域商人尤多。元杂剧等俗文艺的繁荣表明市民生活内容的丰富。

《水浒传》中很少看到对百姓贫困生活的描写，多是繁荣的景象：

第一，生活的繁荣和富裕。《水浒传》开场便是东京的生活，第六回鲁智深初到东京看到的是“千门万户，纷纷朱翠交辉，三市六街，济济衣冠聚集”^①。大名府和其他州府的许多场景都描述了城市的繁华，连五台山下一个小镇也有六七百人家，打铁卖肉各业齐全，农家生活也是比较富足的。史进、晁盖、宋江等人均是家道殷实，最贫困的三阮也还吃酒赌博。

第二，商品的流通。鲁智深在渭州一出场的装束是“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林冲出场时“手中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第十二回杨志出场时“头戴一顶范阳毡笠”，第二十三回武松与宋江告别时也是“戴着个范阳毡笠”，第三十五回石勇出场时“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铜环”，反面人物西门庆做着绸缎庄生意，第四十五回描写裴如海和尚“山根鞋履，

^① （明）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

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缕丝绦，系西地买来真紫”。这说明当时日用品已走向商品化，还出现了知名品牌。

第三，娱乐业的兴盛。《水浒传》中有勾栏瓦舍的描写，民间艺人如阎婆惜、白秀英等人足迹遍及这些场所，李师师受到皇帝的重视，伎艺服侍上至皇帝丞相，下及市井小民，连李逵也常去听书，呈现出娱乐业的兴盛。

3. 宽松的时代

宋元王权主义的文化压抑机制有所松缓，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曾立誓“不欲以言罪人”和“优待文士”。整个宋代没有发生统治集团内部大规模的杀戮，士大夫的人格也受到了尊重。宋代的民间思潮也很活跃，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出对皇权称谓不像其他朝代那么神秘和恭敬。这与大宋从未实现真正的大一统有关，也与其他文明对本民族文明提供参照和多种选择有关。蒙元一代对思想控制的放松，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异端思想的诞生。同时，野蛮的统治激起强烈的反抗意识。《水浒传》中那股强梁之气是元代作品所特有的。文人地位的失落使他们对社会产生不满，同时从经济和心理上摆脱了对王权的依赖，开始更多地关心个人权利和平民生活。这呈现出思想者的独立、思想环境的宽松。

4. 腐败的时代

官僚队伍的贪污腐败现象是一个时代性的概念。在早期封建社会，政治组织与亲属组织高度一体化，全社会由宗法关系构成，谈不上吏治腐败。在封建社会中期，官僚组织与血缘组织分离开来，以官统贵，吏治清廉问题才提上日程。

宋明之际由于宗法精神的废弛，官长和子民之间的道德义务降低，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又提供了聚敛钱财的必要条件，腐败以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为开始，以制度的全面溃烂和失效为结局。专制制度与商品经济相结合，使该时代既有专制社会的暴虐专横，又有商品经济初期的扩张贪婪特征。

对腐败黑暗现象的揭露在《水浒传》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以制度性的不适应为例：（1）生产的发展使工商业者有了经济地位，但法律却不能对他们的经济利益予以保护，江南居民因随意摊派的花石纲而大量破产，孟州道上的客商妓女要向官匪勾结或军匪勾结的黑社会交保护

费；（2）对于大量游离于土地和宗法关系之外的人员，一部分被朝廷扩充到军队中（宋太祖时禁军厢军共 22 万，仁宗庆历时激增到 126 万），以致社会上充斥泼皮和军汉，这些人在小说中被充分反映出来。

5. 异端的时代

宋代的经济繁荣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刺激了功利主义的产生，南宋之后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和重视直接表现在立法观念上。北宋李觏、南宋陈亮、叶适等人都公开言利，李觏说：“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① 而在陈亮看来，不计功利，哪里还有仁义道德的存在？故陈傅良把他的思想概括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②。叶适对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正是与功利主义论辩的产物。

宋人的很多言论代表了商品经济发展后工商业阶层的呼声和利益，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都有过类似“与商贾共利”“士农工商皆本”之类的言论。^③ 范仲淹在《四民诗》中表现了对辱商政策的不满：“此弊已千载，千载犹因循。吾商竟何罪，君子耻为怜。”欧阳修主张“不惜重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苏轼则主张“农末皆利”。南宋士大夫反“抑末”的观点更加激烈和普遍，陈亮说：“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叶适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王化兴，抑末原本，非正经也。”《水浒传》也表现了对商人的特别尊重。这反映了工商业者的地位提高后，必然要求社会对这种利益予以尊重。

元代著名思想家邓牧在《君道》一文中说：“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这指出天下不是一夫之私产，抨击秦以来君主夺人所好，所以“勿怪盗贼之争天下”，其表现了强烈的人权、民主意识。在哲学领域，陆九渊的心学，其发展到王阳明的“我心即宇宙”，从认识论上还给了个人认识真理的权利。陈亮认为：“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这就剥去了“道”的神秘外衣。叶适说：“时自我

^①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标点本，第1269页。

^② （宋）陈傅良：《止斋文集》卷36《答陈同甫》，四部丛刊本。

^③ 朱勇：《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为之，则不可以有所待也；机自我发之，则不可以有所乘也。不为，则无时矣，何待？不发，则无机矣，何乘？”这种“我为我发”的精神在哲学上充分表现了对个人价值的认同。伴随着生产生活的变迁，宋人的疑古创新思想一直没有间断，在元明两代朝异端方向发展，并以朴素的民间形态表现出来。宋明之际反传统的自由化思潮，在《水浒传》中得到真切而强烈的表现。在学士哲人们头脑中使用“批判的武器”时，梁山好汉们则在江湖上进行“武器的批判”，个人权利思想在各种形式中表现出来。

（二）梁山社会分析

1. 好汉成分分类和文化整合

梁山好汉来源复杂，从出身和阅历来看，其中农村劳动人民出身的，包括农民、渔民、猎户，有李逵等7人。地主出身的，有晁盖等9人。军官出身的，有鲁智深等21人。下层官吏出身和上山前曾做过官吏的，有宋江等11人。杀人越货出身的，有李俊等8人。恶霸黑帮出身的有穆弘、穆春、施恩3人。江湖游民出身的，包括赌徒闲汉、小偷马贼、卖解相扑，有石勇、白胜、时迁等7人。市民出身的，包括商户、手工艺者、屠儿刽子、管家仆人，有卢俊义等12人。一出场就是绿林出身的，有朱武等27人。^①以上分类并不穷尽，如还有个别道士、书生等。绿林出身的好汉落草前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很多好汉经历颇多，阅历丰富正是江湖好汉的本色。

五花八门的出身必定把各式各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带入梁山社会。有人认为梁山文化反映了游民无产者的思想倾向。^②近年又有学者指出梁山道德是一种行帮道德，杀人屠村、劫掠州县，都表现了其残酷性和狭隘性。张青、李俊图财害命，石秀、杨雄因小事而杀人分尸更是纯粹的犯罪行为，其集团有江湖帮会和黑社会组织的色彩，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带有一定的犯罪性质。梁山事业的发展壮大过程正是对不同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习惯的文化整合过程。整合是人的重新社会化过程，本书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整合的基础是义。《水浒传》从头到尾饱浸着义的精神，义是一种复杂的道德观，义的内涵起码有三个特点：（1）义是打破了血缘和

^① 杜朝伟、王鹏编著：《水浒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② 周克良：《〈水浒〉非写农民起义说》，《大庆师专学报》1984年第4期。

地缘关系的道德信条；（2）义是江湖义气，互利互报，讲人情不讲原则；（3）义包含有关怀众生、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勇于舍己的精神。好汉们尽管成分复杂，但都“义胆包天”，所以，义成了把这群江湖好汉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第二，整合的主导文化是文明、常态的。梁山的主导文化，在座次上予以集中体现。在天罡中，有一定文化阅历，胥吏、军官、财主、道士、书生出身的人占满了前二十名；在地煞中，前十一名中竟然有八名军官和三名知识分子；梁山的主导人群是官吏、军官和劳动人民，表明其主导文化以当时的社会文明为主导。

第三，梁山聚义是个人的重新社会化和群体寻找目标的过程。梁山的重新社会化过程首先是对个体成员的同化，《水浒传》中对一些发生在好汉身上的不良行为一开始就表示了否定，如鲁智深痛打小霸王周通、晁盖骂时迁偷鸡等，梁山好汉无论以前从事何种“犯罪”职业，上山后都能以大义为重，遵守纪律，抛弃劣习。同时，这也是行为和目标的自我提高，从劫掠客商到放过客商，专一劫富济贫，惩治贪官；从满足于喝酒吃肉，小打小闹到打出替天行道旗号，公然“要与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梁山逐步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和行为准则——契约社会及其道德。

2. 梁山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

（1）以才能排定座次

梁山好汉一共排过七次座次，每一次都是梁山事业的发展台阶。

第一次是在第十二回，排座次基本是先到者凭资格对权力资源的垄断。

第二次是在第十六回“七星小聚义”，这次排座次体现了小型秘密组织应有的纪律和秩序。

第三次是在第二十回林冲火并王伦之后，这次排座次过程使梁山社会与江湖帮会区别开来。

第四次是在第三十五回，花荣、秦明等一批人马上梁山后，基本是按德才标准排的。

第五次是在第四十一回，梁山好汉劫法场和宋江智取无为军后，原则是“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

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处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①。在排位困难的情况下重新论功行赏，是公平和有气魄的。

第六次是在第六十回，在晁盖中箭身亡后，每人向上升一位。

第七次是在第七十一回，综合性才能成为排座的主要依据，并兼顾了出身门第、文化教养、武艺功劳，甚至考虑到了对那些被“拽”上梁山将领的补偿。排座和分工体现了公平竞争、才有所用的精神。

(2) 以贡献分配利益

梁山上的利益分配既不是平均主义，也没有严格的等级，按才能贡献合理分配，每次视情况而定，没有固定差异。如第二十回中：“三阮领得了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众头领看了打劫得许多财物，心中欢喜。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样取一半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② 第四十一回晁盖将黄文炳的家财分赏众多出力的小喽啰。从第六十八回破曾头市后“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回梁山泊给散各都头领，犒赏三军”^③来看，分配原则是等差有序的。

梁山的社会性物资分配还体现了合理补偿、弱有所保的精神。鲁智深、宋江等人上山前多有扶弱济贫之举。在梁山事业做大后，好汉们冲州撞县，除破曾头市外，曾多接济百姓。梁山劫富济贫不是农民的平均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救济措施。

(3) 平等、人性的理想社会

《水浒传》第七十一回那篇“单道梁山的好处”的言语对平等、人性的理想社会模式进行了集中阐述：

山分八寨，旗列五方。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断金亭上，高悬石绿之碑；忠义堂前，特扁金书之额。总兵主将，山东豪杰宋公明；协赞军权，河北英雄卢俊义。施谋运计，吴加亮号智多星；唤雨呼风，入云龙是公孙胜。五虎将英雄猛烈，八骠骑悍勇当先。……人人戮力，个个同心。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伯业。列两

^① (明)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页。

^② 同上书，第253、254页。

^③ 同上书，第901页。

副仗义疏财金字障，竖一面替天行道杏黄旗。^①

在不同版本上这段话略有差异，但大意相同。梁山好汉几次小聚义、排座次、分工任职都体现了相同的社会理想，以下对此现象做一分析。

第一，平等的人际关系。梁山上虽有座次不同，但不论排名先后，大家“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体现了平等精神。在军事组织上，“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山前南路第一关，解珍、解宝守把；第二关，鲁智深、武松守把；……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余各有执事”^②。六关八寨及各房是平行并列关系，与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吏和军队制度相比有天壤之别。

第二，每个人的特长得到尊重和发挥。在第七十一回的大聚义中，梁山的职务分派体现了人尽其才的原则，军事人才在重要位置当其大任，管理技术人才在后勤岗位上施展能力，像有间谍情报天赋的人也有了用武之地，工匠酒保之类也能名列好汉，真是各尽所能，随才器使。水浒的人才思想一直为人们所乐道，仅举职位分工表以资说明：政治、军事、经济决策层 7 人；军事将领 64 人；情报人员 13 人；警察、内保人员 8 人；掌管监造诸事头领 16 人。可以看到，梁山不仅是个军事组织，而且可以看出百业齐全，高度分工，劳动社会化，每个人得到相应的位置。

第三，契约化的政治制度。梁山社会是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旧制度的一切身份等级和人身控制统统被抛弃，对猎户、渔人、屠户等一视同仁，废除了诸如主仆、长幼、夫妻之间不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对粗鲁、精细等不同人的不同个性一概地包容和尊重。打破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不分帮伙姓氏，以忠诚信义为唯一道德原则。对个人权利充分尊重，给每个人平等竞争、自我实现的机会，同时每个人也只能凭个人的奋斗，而不是靠社会关系来获得机会。

二 《水浒传》与民俗文化的研究

“民俗”一词并不是新鲜词汇，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早就有了记载。

^① (明)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32、933 页。

^② 同上书，第 928 页。